NIHONGO NO GAKUSHU TO KENKYU 日語学習与研究
2025年 第5期 总240号

具身认知与文化图式：中意习语语义的比较研究
——兼论“差序格局”与“团契家族”的语言映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意大利研究中心　　吴　菡

[摘　要]　习语作为语言中承载文化内涵的独特表达形式，是洞察民族认知方式与社会文化心理的重要窗口，本研究旨在探讨中意两国习语在语义层面如何反映各自的文化特质。通过整合具身认知及文化语言学理论，采用对比分析和习语语料库进行词频统计的方法，研究发现：中意习语均深刻体现了具身认知的基础，大量借用身体部位、感官经验及物理世界的意象来建构抽象语义，但两者在具体表达形式及文化赋义上存在显著差异。汉语习语鲜明地映射出“差序格局”的文化模式，强调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等级秩序以及“人情”“面子”等社会交往规范。而意大利习语则集中体现了“团契家族”模型中的双重社会逻辑，即以家庭为核心的纽带作用与契约性团体合作的互动模式，反映了家庭至上、集体荣誉、成员忠诚及社会表现（如“bella figura”）等文化价值，两国习语所承载的文化图式和文化范畴展现出明显的文化特异性。本论文系统地将具身认知理论、文化语言学理论与社会文化模型相结合，旨为习语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融合性研究视角，通过对具体语料的实证分析，既可深化对习语文化语义生成机制的理解，也可为中意跨文化交际和语言教学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习语　文化语义　具身认知　文化图式　差序格局　团契家族

引　言

习语作为语言中高度凝练的文化符号，植根于文化共享的隐喻系统与图式结构，承载着特定社会的认知模式、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Gibbs, 2006; Sharifian, 2017）。近年来，文化语义学与具身认知理论的结合为习语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强调语言意义如何通过身体经验与文化模型的互动得以建构（Lakoff & Johnson, 1999; Palmer, 1996）。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文化语境或进行以英语为代表的中西对比。本文选取意大利作为对比研究国家，一方面由于中意两国都拥有数千年文明，其语言都承载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结构烙印，为我们观察文化模式如何长期、稳定地“沉淀”到语言习语中提供了理想的样本。另一方面，两个文化都以重视家庭、家族纽带而著称，但其内部的组织原则和社会延展方式又截然不同，为我们精确对比语言所反映的不同社会模型提供了绝佳的“准控制变量”。本文结合具身认知理论与文化语言学的视角，引入费孝通“差序格局”与意大利“团契家族”模型作为社会文化分析的框架从理论层面整合认知语言学与社会文化理论，揭示习语语义生成的多维动因（具身认知、文化图式、社会结构）。

本文所分析的“习语”主要聚焦于那些源自具体、可感的物理经验（如身体、家庭、农业、空间等），并通过意象映射来表达抽象概念的语言单位。这样做是为了将分析的重心始终保持在“具身认知→文化图式”这一核心逻辑链上，而非分散于对不同修辞手法的微观辨析。至于“结构隐喻、

概念隐喻、图式隐喻”等更精细的层级划分，诚然是深化本研究的重要方向，但考虑到本文的宏观论证框架，我们将其视为一个值得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索的课题，在本文中暂不作深入展开。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1.1 具身认知理论

具身认知理论（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起源于二十世纪末，是现代认知科学的重要转向。该理论主张人类的思维活动、语言理解和知识表征均与身体的感知经验和行动紧密相关，而非抽象于经验之外的“冷”处理系统（Lakoff & Johnson, 1980; Varela, Thompson & Rosch, 1991）。具身认知本身可分成两组关系，一是身体和认知的关系；二是身体、认知与环境的关系。

Barsalou（2008）认为，语义表征本质上是以感官运动系统（perceptual-motor system）为基础的，理解语言时大脑会自动模拟相关的身体经验，如听到“keep someone at arm’s length”时，大脑中会自动模拟“距离感”的身体经验，这一观点也得到神经语言学、实验心理学等角度的证据支持（Pulvermüller, 2005; Bergen, 2012）。

根据Kövecses & Szabó（1996），英语习语中有大量关于身体“部位-动作-心理状态”的隐喻，其本质是“具身意象图式”（image schema）的语言化。在意大利语习语中，高频词如mano（手）、cuore（心）、testa（头）、occhio（眼）常承担社会功能暗示。汉语中“放下架子”（姿态=社会状态）“心照不宣”（心理=认知）等也反映了身体意象不仅关乎语言表达，更映射出文化社区对“世界-身体-社会”关系的整体观念。Gibbs（2006）在*Embodiment and Cognitive Science*中也提出，身体感知与行动直接参与了语言习得和习语理解的过程。

Sabine De Knop和Frank Boers（2010）在跨文化习语研究中强调，不同语言对同一身体经验的编码方式有所不同，这也是文化差异的源头。大量不同语言中的个人化、即时性的身体经验经具身认知的理论和系统性研究，抽象出身体塑造思维方式、构建抽象概念和思维模式的认知机制，应用具身认知理论分析习语，不仅有助于揭示其语义产生的机制，还能够进一步理解不同文化社区在构建抽象意义时惯用的“身体隐喻”路径（Lakoff, 2014）。因此，习语反映的常常是身体、认知和环境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环境不同，体验就可能有差异[1]。具身认知与文化模式具有交互作用，即所谓“身体-文化双重嵌入性”（Sharifian, 2017）。这为我们探索“差序格局”“团契家族”模型如何通过身体意象在习语中表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年来，隐喻的具身性理论在认知语言学领域也得到持续深化和实证支持。Khatin-Zadeh等（2023）综合大量行为实验、神经成像以及语料库研究的证据，系统论证了“隐喻性具身”的核心观点：人在理解和处理抽象隐喻时，实际上会调用和激活与隐喻基础经验直接相关的感觉运动神经系统，如理解“抓住（一个想法）”这类动作隐喻时，对应的肢体运动区域会被共同激活。这意味着，抽象的概念理解深深植根于具体的身体经验和感知模态之中。这一发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意义具身化”机制的理解，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跨模态分析视角，使我们得以尝试探究不同文化图式如何通过习语的具身隐喻表现出来。

1.2 文化语言学：文化图式、文化范畴与文化模式

文化语言学是由Sharifian（2011、2017）等人系统提出的理论范式，强调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文化概念、文化图式、文化范畴与文化模型的载体。同时也是研究人类语言的文化性质，价值和意象的综合性学科，整合了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的综合视域。[2]

Holland & Quinn（1987）的“文化模型理论”、Wierzbicka（1992、1997）的“自然语义元理论”（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NSM）也为文化语言学提供了重要视角。Holland & Quinn认为文化模型是“人们理解世界和行为的习惯性隐性剧本”。Wierzbicka则指出：每种语言中似乎都隐含着本民族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这些通过习语、谚语、常用表达被不断重复和强化。此外，Otto San-

ta Ana（2002）在西班牙裔美国社区的习语研究中证明，集体认知图式直接影响了对社会他者的隐喻化与范畴化表达。

Sharifian（2017）认为，语言通过各种“文化概念化体系”（cultural conceptualizations）完成意义构建。核心包括：文化图式（cultural schemas），群体共享的经验脚本（如“待人以礼”“亲上加亲”）；文化范畴（cultural categories），文化群体如何概念化与划分世界（如“亲疏”“内外”“上下”等关系词汇的分类方式）；文化模式（cultural models），一套更为宏大的认知模板，影响群体的决策、评价与行为倾向（如本文的“差序格局”“团契家族”）。因此，在文化语言学视角下，语言不只是语法结构和词汇系统，更是文化概念的表达，文化范畴和文化模式决定着各自语言习语和隐喻的形成逻辑，以及意义解释的资源优先级。

1.3 社会文化模型

1.3.1 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

费孝通在其经典著作《乡土中国》（1948）中提出“差序格局”理论，指出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并非基于平等或契约，而是类似水波一样，由“己”为中心向外推展，呈现出层层递减、疏远的同心圆结构，为理解中国社会结构提供了极具洞见的分析框架。

所谓以“己”为中心是指每个人都以自己为社会关系划分的原点，将社会成员按照亲疏、远近、关系强弱进行排序。社会资源的分布与流动从自我、家庭、亲戚到更外围的朋友、熟人、陌生人，讲究“亲亲相隐”“远水不救近火”。社会网络如同水面涟漪，以个体为中心不断向外扩展，不同圈层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形成圈层结构，社会互动强调“人情往来”“礼尚往来”。

1.3.2 意大利“团契家族”及相关社会价值观

意大利社会传统上以“家庭主义”（familismo）为核心。文艺复兴时期，因上层社会对荣誉的崇尚，意大利人倾向于维持大家庭形式的存在。阿尔贝蒂的《论家庭》中的主人公就视“让大家同住一个屋檐下，同烤一堆火，同吃一桌饭”为己任[3]。尽管随着商业活动的开展和财富增多，意大利北方家庭逐渐核心化，中世纪自治城邦制度亦孕育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团体认同（如佛罗伦萨、威尼斯），市民身份与职业行会构成横向联结，发展了基于契约、协约团体（如行会、协会、宗教团体等）的社会格局。但意大利南方作为传统农业社会，仍存在较强的家族势力，呈现“拟差序”特征（如通过联姻扩展关系网络）。因为我们认为这种以家庭为核心，继而在宗教及商业环境下延伸拓展开的团体-家族并行的“双轨模式”，构成了本文所提出的“团契家族”模型。

Banfield（1958）在对意大利南部村落的经典人类学调查中提出“amoral familism”（非道德家庭主义）概念，指出村民普遍只关心家庭内部的利益，以维护家族为最大善，“在超出家庭利益时，既无积极助人之利他主义，也很少公共责任感”（Banfield, 1958: 10-11）。然而，近现代意大利社会也发展了大量建立在契约和团体合作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如工会、企业、行业协会、天主教兄弟会等，这些“契约性团体”在家庭之外构建了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

葛兰西在分析意大利社会“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时，亦强调“家庭-团体-社会”的多层嵌套结构，指出团体协作和同盟关系对于社会管理和意识形态塑造具有重要意义（Gramsci, 1971）。涂尔干在其社会分工理论和宗教生活研究中，也认为近代社会成员不仅通过血缘共同体连接，也主要依靠“有机团体”的契约关系形成社会秩序（Durkheim, 1893、1912）。Putnam（1993）则将这种复合型社会结构归因于家庭-团体“结合型社会资本”（bonding & bridging social capital）的协调，指出意大利北部经济发展与这种契约性团体格局强烈相关。

因此我们认为本文所使用的意大利“团契家庭”模型，其核心特征包括：家庭纽带强大，成员间互助、忠诚、信任被至高推崇。团体协作与契约意识普及，强调团队、协议、共同目标。家庭与团体，内外资源分配界限清晰，但在行会、企业、宗教等“集体家庭”内责任感同样深厚。

基于以上理论框架，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核心问题：中意习语如何通过具身隐喻（如身体部位、动作意象）反映各自的文化认知模式？两国习

语在文化图式与范畴化方式上有何异同?“差序格局”与“团契家族”这两种社会模型如何分别塑造汉语和意大利语习语的语义范畴与文化图式?

基于上述问题,本论文将以汉语和意大利语习语为核心语料,提炼中意习语中高频的具身认知与文化主题,通过词频统计筛选出意大利语中与家庭、团体、契约相关的核心表达以及中文中反映“差序格局”特征的典型表达(如“礼尚往来”“看人下菜碟”),从而结合语料探求两国习语在社会关系、集体价值、个体行为方面的编码方式,最终构建“认知-文化-社会”多层互释的理论模型。

2 中意习语的具身认知-文化图式融合链及文化模型分析

2.1 语料选取与研究方法

2.1.1 意大利语习语的语料选取与初步分析

本文写作论述所选取的意大利语习语语料来源于意大利权威词典Hoepli: Dizionario dei Modi di Dire della Lingua Italiana及Sabatili coletti: Devoto-Oli。此外,为测试意大利语习语的高频词汇和语义特点,避免研究者利于结论性的语料选择主观性,文章选取了包含45种语言习语的crossIdiomas.com习语研究专门网站所列举出的811条意大利语常用习语作为测试语料。网站所列全部习语以意大利语字母顺序排列,涉及文化生活的不同方面,且习语均可在权威字典中得到印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选取上述811条语料后,我们对其进行了包含以下内容的编码:(a)字面义;(b)隐喻/转喻义;(c)所映射的源域;(d)所指向的目标域;(e)所属的文化图式;(f)所体现的核心语义范畴。为保证编码的客观性和一致性,本研究采用双人编码与第三方仲裁模式。研究者本人与另一位精通中意双语的语言学研究者首先独立对10%的样本(约80条)进行背对背编码。经过计算,两次编码的科恩信度系数(Cohen’s Kappa)为0.85,达到了高度一致性标准。对于少量存在分歧的条目,则提交给第三位专家进行最终裁定,并共同商议完善编码准则,随后将此准则应用于全部811条语料的分析中。

关键词分析(Keyword Analysis)作为量化方法,结合语料频率(frequency)与关键词突出度(keyness),可以识别习语中的核心意象与文化要素,通过词频分析,我们发现意大利语习语语料具有以下的结构特点:

首先,从首字母统计来看,本文所测试的811条意大利语习语中,A、F、C、D等动词或介词开头的习语出现频率最高,如fare“做”、mettere“放”、prendere“拿”、essere“是”与人称代词密切结合,突出行动导向和互动性,反映意大利习语以动词驱动、动作导向为主的表达方式。

其次,从名词的角度看,语料中前20的高频名词包括mano(手)、cuore(心)、testa(头)、occhio(眼)、bocca(口)、sangue(血)、parte(部分)、terra(土地)、mare(海洋)等,其中身体部位名词(如mano“手”、testa“头”、cuore“心”、occhio“眼”)高频出现,反映了身体经验在表达社会关系和心理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如mettere le mani,字面意为“放下双手”,表示“动手参与”;avere un cuore di leone,字面意为“有一颗狮子般的心”,表示“勇敢无畏”)。同时,生命与土地、海洋、田野、光等与自然风物相关的名词高频出现,也说明了后文将详细阐述的以农业传统、海洋贸易、宗教伦理为核心的意大利文化图式特征(见表1)。

表1 习语名词词频表

排名	意大利语名词	出现频次	中文含义
1	mano	38	手
2	piedi	24	脚
3	testa	22	头
4	acqua	18	水
5	cuore	17	心脏
6	terra	16	土地
7	occhi	15	眼睛
8	parole	13	话语
9	tempo	12	时间
10	sangue	11	血液
11	vita	11	生命
12	mare	10	海洋
13	fuoco	9	火
14	parte	9	部分
15	voce	8	声音
16	lingua	7	舌头
17	aria	7	空气
18	campo	6	领域/田野
19	gioco	6	游戏
20	luce	6	光

最后，尽管从单个词的词频中无法完全获得有关家庭和团体的表征信息，但习语整体指涉家庭、团体、契约的内容数量庞大，如：

No.151“buttare il bambino con l’acqua sporca”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比喻）因小失大

No.288“essere di casa”家里的；（比喻）非常熟悉、自在

No.375“focolare domestico”炉火；（比喻）家庭；温馨的家

No.790“ungere le ruote”给轮子上油；（比喻）上下打点维护利益

No.793“uccel di bosco”林中之鸟；（比喻）家庭中的浪子

No.76“a quattr’occhi”四只眼对四只眼；（比喻）当面私下谈话

No.113“a porte chiuse”关门进行；（比喻）团体内部排他性商讨

No.370“fare quadrato”组成方阵；（比喻）团结一致，共同抵御

No.401“gioco delle parti”扮演角色；（比喻）各司其职

No.477“mela marcia”烂苹果；（比喻）害群之马

No.699“sulla stessa barca”同舟共济；（比喻）休戚一体

No.2“avere le carte in regola”（法律、行政）证件齐全；（比喻）资格合法

No.14“apertura di credito”（金融）开立信用；（比喻）给予信任或支持

No.175“cambiare le carte in tavola”（商业）变更桌上的牌；（比喻）改变既定规则安排

No.203“con beneficio d’inventario”附有财产清单的；（比喻）保留意见地、有条件地，法律语境下表示继承时仅以遗产现状为限承担责任

No.373“fare i conti”（财务）算账；（比喻）评估算计、利弊权衡。

上述习语表明意大利社会重视亲缘纽带与团队协作并重的文化倾向，为后文家庭及团体契约精神领域的阐述提供了材料基础。

2.1.2汉语习语的语料选取

汉语习语多来源于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宗教典籍、民间传说等，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根据内容和形式的不同，习语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如成语、谚语、歇后语、俗语。

考虑到汉语习语的数量庞大，本文所选取的典型汉语习语样本，旨在能同选取的意大利语进行对比和定性分析。汉语习语词条主要源于CCL语料库及主流汉语词典（《汉语成语大词典》《汉语俗语词典》）。选取标准包括：1）与意大利语习语在结构、语义功能上尽可能配对，实现主题对位分析，力求保障语料的可比性。2）语料涵盖具身隐喻、亲属关系、人情往来、社会等级、交际策略等内容。3）重点选择词频较高、现实语境中常用的表达等。

2.2　中意习语中的具身经验

意大利语习语极富具身性特征，身体部位及其相关动作被广泛用来表达情感、态度、社会互动等各种抽象概念。比如：

1）avere le mani in pasta（插手某事，字面：把手放进面团里）

强调“手”的干预，引申为参与、干涉，为多方事务或资源提供实际支持，具身的触觉、体感（揉面的力度）转化为对事务“深度参与、亲力亲为、掌握内情”的隐喻。

2）costare un occhio della testa（极其昂贵，字面：花去一个眼睛的代价）

强调“眼睛”作为宝贵之物，是对代价、损耗这一抽象概念的身体化表达。

3）avere il cuore in gola（字面：心提到嗓子，形容紧张、担心）

“心”与“嗓子”结合，将紧张情绪具体化为身体体验，反映出对内心波动的具身感知。

4）parlare a braccio（脱稿讲话，字面：抱着胳膊、即兴讲话）

动作与表达的结合体现即兴、自然、不加修饰的交流风格。

上述习语说明意大利文化重视身体感官在语义建构中的作用。身体部位不仅涉及物质层面，更频繁连结心理、道德和社会交往维度。汉语习

语同样高度依赖具身经验，会将抽象的心理过程、社会活动乃至道德评价具体化为身体部位和动作隐喻。

头：常用以表示思维、主导、起始等。如“头头是道”指条理清晰。

心：映射情感、意志、品德，如“心知肚明”表隐形共识，“心狠手辣”斥道德失衡。

手：多关联行动、权力、参与。如“袖手旁观”表置身事外；“一手遮天”寓指独断专行。

眼、耳：与认知密切相关。“耳濡目染”用于强调长期影响和无意识感染；“洗耳恭听”以身体动作表现出尊重与专注。

口：象征表达、言论，如“守口如瓶”强调保守秘密；“巧舌如簧”比喻善于言辞。

除上述身体部位外，“心有灵犀”“眉来眼去”也都是身体与情感交融的具身范例。这些身体部位和动作的隐喻用法，使得汉语习语能够生动形象地传递抽象意义，这既是普适的人类经验在语言上的映射，也是中国文化对身体与心灵不可分割理解的体现。

2.3 概念融合理论

Fauconnier & Turner（2002）的概念融合理论强调，语言中的习语并非简单比喻，而是通过不同认知域（如具身经验与社会结构）的动态叠加和融合，生成独特的文化图式。这一理论对于解释习语中身体-文化之间的过渡尤为关键。在具体语言实践中，身体感知与经验为习语提供了丰富的图像和动作基础。例如，意大利语和汉语中都存在身体部位、感官动作极易与社会评价和行为规范交织的情况。同时，习语又会在具体语境下被“激活”，将具身经验与高阶社会、文化图式相融合，实现抽象社会意义的具象化压缩，从而最终形成“具身认知-文化图式”的融合链条，以下选取数例中意语料进行分析：

意大利语习语

1）avere il coltello dalla parte del manico（握着刀柄）

具身域：握住刀柄的动作，表示对事态的主动掌控。

文化图式域：转喻为在社会谈判或人际冲突中拥有优势地位。

——身体操作投射到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图式，将工具操作隐喻为社会主导权。

2）avere la testa sulle spalle（头长在肩上）

具身域：“头”作为认知和决策中心，“肩膀”作为支撑平台。

文化图式域：比喻人很理智、现实，善于做出靠谱判断。

——具身结构文化化，形容具有判断力的人，融合身体与认知能力的社会评判。

3）restare a bocca asciutta（嘴唇干裂着）

具身域：嘴巴干，渴望却未得满足。

文化图式域：失望而归、空手而返，表达社会场合中的“落空”情绪。

——生理反映心理期待，融入失落的社会交往。

汉语习语

1）半路出家

具身域：“半路”是空间移动的具体经验，“出家”是宗教仪式中的具身行为。

文化图式域：比喻中途改行，仪式性动作喻指身份重构，将身体位移编码为适应性智慧。

——空间行动＋身份转换，构成中国社会关于适应与转变的动态图式。

2）点头哈腰

具身域：点头、弯腰等身体动作。

文化图式域：形容逢迎他人的社会行为规范。通过低位身体语言具象化等级关系，弯腰幅度成为权力距离的标尺。

——低身体姿态和社会等级关系相融合，将具身动作转为权力不对等的文化图式。

3）敲边鼓

具身域：演奏边鼓的动作。

文化图式域：比喻在主事务之外从旁助力，表达关系维系的间接性交往。

——动作的附属性映射到社会中的配合与策略性行为。

在上述例子中，习语的意义生成往往始于身体行动或感官体验（具身认知），经由隐喻和图像压缩等认知机制，跃升进社会组织、行为判断和文化价值（文化图式）。通过概念融合理论我们不仅

能发现习语表达的创新动力，也清晰解释了身体经验如何“上升”为特定社会文化系统的核心范畴。

2.4 意汉习语的具身认知-文化图式融合链条

2.4.1 意大利语习语表达中的文化图式与文化范畴

意大利习语高度依赖社会生活图式和文化范畴，常用事件、情感、物质和宗教符号构建意义。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看，意大利语习语的隐喻密度很高，符合Palmer（1996）提出的“强意象性文化”。通过上文的词频分析和语料分类，我们发现意大利语的习语可提炼出土地-亲属、海洋-冒险、宗教-契约、艺术-表达这四类图式，最终形成以“血-海-灵”为核心的文化范畴。其中“血”代表农业种植集聚的家庭血缘关系，“海”代表商业探索带来的合作与友谊，“灵”则代表基督教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所表达的精神维度。

1）土地——亲属图式

意大利语的具身隐喻突出，常依赖味觉、触觉、视觉的直接体验，反映地中海文化对感官愉悦的崇尚。因此与地中海生产相关的土地、食物、劳动、家庭空间都会成为社会认知的源域。比如“fuori del seminato”（播种到农田以外→离题、不按常规办事）。“essere buono come il pane”（像面包一样好→善良）将面包的触觉与道德绑定。“essere un salame”（像萨拉米香肠→愚蠢）将香肠圆滚结实的视觉与智慧联系。“con il sorcio in bocca”（嘴里含着老鼠 →难以启齿的尴尬）用视觉的形象性描摹感受。此外还有与家庭聚会及社交活动紧密相连的“carne al fuoco”（肉在火上→业务多任务重），“alla frutta”（到水果环节→临近结束），“mettersi a tavola”（上桌→开始谈判）。

2）海洋——冒险图式

“navigare a vista”（凭视力航行→随机应变），反映航海共和国（威尼斯、热那亚）历史，以航海动作隐喻商业冒险精神，体现从家庭安全圈（港湾）到开放契约（远航贸易）的过渡。也是因为海路，阿拉伯文化影响了西西里岛，于是有了源自阿拉伯医学的“盐平衡”理论，出现了“avere il sale in zucca”（脑中有盐→有常识），“essere il sale della terra”（大地之盐→优秀的、高尚的人）。之后，文艺复兴时期又强化了商业合同、航海合伙制带来的契约精神，“contare i soldi prima di averli”（钱未到手就先数→过早乐观）就反映了佛罗伦萨银行业文化。

3）宗教——契约图式

“piove sul bagnato”（雨落在湿处→祸不单行）源自但丁《神曲》对苦难的具象化描述。“Dio ce la mandi buona”（上帝保佑），用半开玩笑半真诚的宗教色彩表达因担心的祈愿和无奈。天主教与古罗马法融合，以“口”的动作具身化，将《罗马法》的书面契约（pacta sunt servanda）与宗教誓言（如婚礼圣礼）结合，用“dare la parola”（给这个词→给出诺言）体现“家庭血缘誓约”与“团体法律契约”的双重约束。

4）艺术——表达图式

意大利是一个艺术的国度，乐于用音乐、戏剧等艺术形式表达日常事务。比如“dare luce a qualcosa”（赋予光明→阐明某事）源自文艺复兴绘画的明暗技法（如卡拉瓦乔的作品）。“non avere né arte né parte”（既没有艺术也没有部分→没有任何特长或作用、没有影响力）。“dare il la”表示（给出音乐中的基准音A→设定标准或开创先例）。

这些习语将社会行为、个体情感和文化物质元素有机结合，编码意大利人的集体经验和价值取向，形成了家庭性（Familiarità）-契约性（Patto）-神圣性（Sacralità）所对应的“血（Sangue）-海（Mare）-灵（Anima）”文化范畴（见下页表2）。

由此可见，意大利习语的文化范畴不仅源于人类共同的具身认知，也来自于地中海文明与半岛地缘基因及古罗马法权、文艺复兴及天主教的历史积淀。

2.4.2 汉语习语的文化图式和文化范畴

通过对所选汉语习语语料的考察，我们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人情”被普遍概念化为一种可以“欠”“还”“厚”“薄”的“可计量物”。我们认为，这并非简单的隐喻，而是“差序格局”中社会资源交换原则在语言中的投射。此外，我们发现大量汉语习语不仅包含具身认知，更常体现出的内外有别、亲疏有序、面子机制、圈子文化、等级观念、策略性交往等图式，并由此提炼出汉语习语“人情-平衡-关系”这一核心文化范畴。

1）关系导向图式：通过亲疏空间划定人际关系边界

“远亲不如近邻”以地理距离解构血缘等级，强调实用性关系网络。“熟人好办事”“托人情”“打招呼”“知根知底”多围绕“熟悉-生疏”等对立范畴展开，其文化逻辑在于熟人社会的资源分配依赖“关系资本”，显示了中国社会重关系、讲人情的文化模式。

2）道德平衡图式：具身认知投射为伦理标尺

“以德报怨”（儒家恕道）、“拾金不昧”（乡土诚信）等，将身体动作（拾、报）转化为道德实践符号。“过犹不及”源自《论语》，以身体动作的适度性喻指中庸准则。汉语习语的平衡伦理源于中医“阴阳平衡”、儒家“致中和”等思想，因此汉语的习语天然携带动态平衡诉求。

3）策略性交往图式：通过自然隐喻化解冲突

“和气生财”将气息（“气”）的畅通类比社会合作收益。“滴水穿石”以水的持久柔力解构刚性对抗，呼应“以柔克刚”的生存智慧。

我们认为正是这三类图式经过整合构成了以“人情为纽带-平衡为准则-关系为场域”的文化范畴，使得汉语的一些习语成为这类文化范畴的“语言化操作规程”。

3 不同文化模式在习语中的映射

3.1 “团契家庭”文化模式在意大利习语中的映射

在意大利社会结构中，家庭中心主义（familismo）与契约性协作机制构成制度性互补。前者作为初级社会网络的核心组织原则决定群体建构的拓扑序列——血缘与地缘关系构成信任分配的优先级系统。后者则在地缘断裂或跨群体协作情境中提供制度化补偿机制，形成差异化资源分配系统。这种二元结构通过语言认知图式具象化如涉及家庭/亲属语义场的famiglia/parenti/fratello（家庭/亲戚/兄弟），指向契约性协作框架的società/patto/squadra（社会/契约/团队）。

（1）家庭中心主义的文化编码血缘优先的绝对化表述：“Il sangue non è acqua”（血不是水→血浓于水）

强调血缘关系的特殊性，突显家族内部的亲密和忠诚。维护家内自治的边界：“Lavare i panni sporchi in famiglia”（脏衣洗在家→家丑不外扬）

主张家庭事务在家庭内部解决，强化家内团结和对外屏障，维护家庭荣誉。

（2）契约机制的拓展功能协议制度化表述：“fare un patto“（缔结协议）与“mettere nero su bianco”（落墨为凭）共享“文字性契约”的语义基模。“stringere un patto”（缔结协定）通过触觉隐喻“紧握”强化约束力。

团体协作逻辑：“giocare in squadra”（团队协作）突破血缘限制，构建拟似亲属关系（pseudo-kinship），“Una mano lava l’altra e tutte e due lavano il viso”（一只手洗另一只手，两只手洗脸→互帮互助），隐喻契约性互惠。

（3）双轨信任结构的动态平衡

根据语料统计，身体感知类习语常通过具身认知锚定家庭中心主义（如“moglie e buoi dei paesi tuoi”妻子和牛都要选同乡），而自然现象类习语（如“essere nella stessa barca”风雨同舟）则多映射契约韧性。两类习语在交际事件中呈现语境选择性激活——家庭网络提供强信任（strong-tie）的情感安全网，契约团体建立弱信任（weak-tie）的制度化担保。

这种并存证实了意大利社会的关系弹性，即当家庭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张力时，契约机制通过习语认知框架持续再生产协作模式。契约性团体往往模仿家庭的运作逻辑（如“fratelli d’Italia”意

表2 意大利语习语的文化范畴分类表

范畴	内涵	历史层积要素	习语例证
血	血缘亲密、代际责任、土地归属感	农业传统、古罗马家父长制	“avere le radici in un luogo”（在某地扎根）
海	超越家庭的团体互信：商业协议、法律约束、冒险合作	海洋贸易、文艺复兴金融、罗马法	“stringere un patto”（缔结契约）
灵	家庭与契约的终极约束力：宗教誓言、道德神圣感、艺术平衡美学	天主教伦理、文艺复兴人文平衡	“dare la parola a Dio”（对神起誓）

大利众兄弟），而家庭成员之间也需要契约性角色分工和承诺来保证家庭稳定运行。家庭主义决定了团体构建的基本结构和优先顺序，而契约机制则在血缘/地缘关系薄弱或跨群体协作时发挥关键作用。

意大利习语系统证实，强连接网络与弱连接制度并非二元对立，而是通过文化图式形成制度性铰链，这对南欧家庭主义研究亦具有范式革新意义。通过具身认知、文化图式与“团契家庭”社会文化模型三重视角分析可见，意大利语习语深度折射出家庭主义和契约性协作共生的社会观念。无论是家庭内部的凝聚力，还是外部团队、契约群体的合作精神，都借助身体隐喻、情感脚本和文化物象在语言中得到生动展现，塑造了独具特色的意大利文化表达体系。

3.2 “差序格局”文化模式在汉语习语中的映射

“差序格局”通过内核圈层（血缘家族的父子、兄弟）、中间圈层（熟人、社会的朋友、乡邻）以及外围圈层（陌生人、外人）反映出中国社会的一些特点：关系亲疏决定权利义务，而非固定规则的弹性边界，对“自己人”和“外人”采取不同行为标准的差序对待，以及通过人情交换维持关系网络稳定的动态平衡。

根据Lakoff的概念隐喻理论，前文所述的“人情是可计量物”可以被视为一种结构隐喻，但我们认为其深层的社会功能和文化预设，要求我们超越普遍的隐喻理论，而引入“差序格局”这样的本土社会学模型才能得到充分解释。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差序格局”从认知到行为可以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1）圈层区隔机制

包括以“家”为圆心划出隐私保护圈，以身体空间（家宅）映射社会圈层而形成的“内外有别”的圈层意识，以及用饮食动作喻示资源分配而形成的“看人下菜碟”，以身份、地位、亲疏决定社会交往等级的灵活行为策略。

（2）关系动态调控

“礼尚往来”这种礼物交换的身体仪式，用来维系关系网络的互惠循环；“三顾茅庐”通过空间移动次数来量化诚意权重，体现关系构建的累积性。

（3）面子管理系统

汉语中将身体尊严符号化为社会资本。如“丢面子”是以面部作为身份标识，损伤面子即社会评价贬损。“给面子”“留面子”是社交尊重，维护关系和谐。“打肿脸充胖子”是以身体痛苦揭露虚假地位维护，用于讽刺越层行为。

实际上，人们通过身体经验界定关系亲疏，以动作隐喻调节资源流动，以姿态符号管理等级距离，其运作本质就是将“差序格局”编码为习语这种可操作指令，反过来又通过习语将差序格局中的价值分层，使互动秩序和维护机制得到生动浓缩与传递，体现出独特的语言策略和交际规则。

比如“绕弯子”“打哈哈”反映差序格局中间接委婉方式处理人际关系的表达，使策略性交往在跨越不同社会圈层时显得尤为重要。再比如“走后门”“打招呼”体现了差序格局中利用社会网络解决问题，通过人情促进资源流动的社会运作机制。最后，差序格局下的道德评价往往根据关系亲疏而有所不同，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义灭亲”“知恩图报”这些普适的道德原则和根据关系远近而调整的弹性标准反应出差序格局中复杂的道德评价与伦理标准。

总体而言，“差序格局”不仅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核心模型，更通过汉语习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化认知操作系统。从“圈层区隔”到“关系调控”，再到“面子管理”，习语以身体经验、空间隐喻和互动仪式为载体，将差序格局的动态逻辑具象化。这些习语不仅是差序格局的语言化石，更是其动态维持工具——通过日常使用，不断强化“亲疏有别”“弹性边界”的认知模式，使差序逻辑在现代化进程中仍能持续调适。可以说汉语的习语系统为研究差序格局提供了微观语言学证据，表明社会结构并非静态框架，而是通过语言符号的反复操演得以再生产，我们认为这对理解中国社会的关系治理模式及其现代化转型具有一定的跨学科意义。

4 文化语义学视角下中意习语语义差异与共性分析

4.1 具身认知层面的共性与差异

两种语言习语均依赖身体经验作为意义构建

的基础，体现了语言具身本质的共性。从身体部位来看“手”作为行动能力的象征在汉语中有“手足情深”“大手大脚”，意大利语中有“avere le mani d’oro”（有黄金之手→手艺高超）、“dare una mano”（给一只手→帮忙）。“心”作为情感与道德中心，汉语中有“心心相印”“用心良苦”，意大利语有“stringere il cuore”（揪心）、“avere a cuore”（放在心上），这些都体现了人类语言共同的身体经验来源。而就姿态隐喻而言，汉语“抬头挺胸”与意语“a testa alta”（昂首），均以身体直立表达尊严与自信，汉语“低头认错”也与意语“abbassare la testa”（低头）同样表示顺从与认错，这都说明姿态隐喻存在跨文化共通性。

然而，两种语言身体经验的文化编码仍旧存在差异，首先，在身体感知重点上，汉语倾向于以整体姿态与社会互动关联，而意大利语更强调功能性与生理状态。“点头哈腰”关注姿态低下程度与社会等级，“给面子”关注外部社会评价。“a sangue freddo”（冷血地）强调生理状态与行为关系，“avere le mani legate”（手被绑住）注重功能受限而非社会评价。其次，在空间隐喻上，汉语空间隐喻常体现等级感，而意大利语更多表达情境。如“高高在上”“低三下四”侧重社会地位，“essere con i piedi per terra”（脚踏实地），侧重现实主义。

4.2 文化范畴对比：人情-平衡-关系vs血-海-灵

从亲属关系角度来看，汉语强调扩展性与等级性。“长幼有序”展现家庭内部结构化秩序。“远亲不如近邻”反映亲缘关系的边界弹性。然而意大利的这类习语更强调本质性与封闭性，如“Il sangue non è acqua”（血非水）、“sangue del mio sangue”（血脉的血脉，直系血亲）均表达出本质化的血缘关系。意大利是中小企业王国，百年传承的家族企业繁多，因此字面意义上的直系血亲，隐喻义务与忠诚。从语用上来说，血脉身份强化了共同体认同，压缩了反驳空间，通过“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家族价值观，帮助冲突情境中促成一致。这种商业上的算计与血缘纽带、家族精神紧密联系，生动呈现了“血-海-灵”为代表的家庭性、商业性和契约性。

从社会互动角度来看，汉语以人情往来为核心，“看人下菜碟”强调关系的差异化，“欠人情”“还人情”则构建了一个循环互惠模式。比如春节期间朋友之间走动互送特产，常常称之为“礼尚往来”。从语义上来看，其字面义为“礼节应基于往返互赠”，但隐含义则是维系“情面”需在时间与价值上保持“对等”。从语用功能来看，“礼尚往来”既对持续互惠的关系进行了标记，也激活了默认的预设，还确保了双方“情面”不失衡的交际管理。按照本文所列的汉语文化图式就可解析为：a）人情-交际双方关注“情面”与“心意”；b）平衡-回礼的时点与礼物价值要与首礼“相当”；c）关系-通过互馈把交情固化为长期、可信赖的社会关系。

然而在互动交往方面，意语则多以规则和契约为基础，“avere le carte in regola”（文件齐全）强调规则符合，“A caval donato non si guarda in bocca”（别人送的马不看牙齿），强调赠与的情谊优先于物品本身价值，在“心怀感恩”基础上形成的宽容体谅且礼貌的共同体意识，而非像汉语强调平衡往来。

最后，从精神-物质角度来看，汉语强调修身养性、追求内外和谐，认为“心如止水”“心平气和”是平衡的理想状态，并以“身外之物”分离出物质与精神价值，而在意大利语环境中，习语常突出灵魂与精神性的独立存在。“vendere l’anima”（出卖灵魂）将灵魂客体化，“fulmine a ciel sereno”（晴天霹雳）以自然力量表达命运突变。

4.3 文化模型对比：差序格局vs团契家庭

中国差序格局模型的习语表征包括：（1）亲疏有别的社会结构，如“清官难断家务事”；（2）灵活变通的伦理策略，如“和气生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意大利团契家庭模型的习语表征则更体现家庭内聚与外部契约并行，既有“moglie e buoi dei paesi tuoi”（妻子和牛选同乡）表现的封闭性，也有“stringere un patto”（达成协议）的外部世界的契约性。根据社会认知中的“内群体/外群体”理论（Taifel et al，1979），“差序格局”和“团契家族”可以对应为两种不同的“内群体”划分机制。差序格局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亲疏远近不断变化的同心圆

式(concentric)内群体模型。它没有清晰的边界，是一种连续、动态的划分。而团契家族是一种边界清晰、成员身份稳固的团体式(bounded-group)内群体模型，“是”或“不是”团体的一员，界限分明。

从文化语义学的角度看，两种文化习语也恰恰体现了不同的语义网络组织原则。汉语习语呈现同心圆式语义场，核心语义(如“情”“礼”)向外辐射，边界模糊，涉及“人情”的语义场从亲情→友情→人情世故，呈现递减式强度变化。但意大利语习语呈现区块式语义场，不同语义域(家庭、契约、个人)边界清晰，famiglia(家庭)语义与contratto(契约)语义场界限分明，使得“团契家族”模型以双重语义场实现：即家庭中心场(“lavare i panni sporchi in famiglia”家事内化)和契约补偿场(“fare squadra”构建拟亲属协作)。

其次，两种文化下的习语隐喻系统也受到了各自文化的制约，采用不同的基础隐喻作为意义生成机制。汉语倾向于“关系-秩序”隐喻，如“上下有序”“远近亲疏”，而意大利语倾向于“物质-实体”隐喻，比如“giocare a carte scoperte”(亮出底牌)、“mettere nero su bianco”(白纸黑字)。

再次，不同的文化模型使得两者在面对冲突的策略以及社会资本积累方式上也存在差异，这一点也体现在两者的语用策略社会适应性上。汉语“忍一时风平浪静”强调妥协与内部消化，意大利语“sparare a zero”(毫不留情批评)对抗性更强；汉语“投桃报李”讲究通过互动积累社会资本，意大利语“fare la rete”(建立网络)更强调结构性网络建设。汉语习语含蓄委婉，“说曹操，曹操到”，避免直接点名，适应长期稳定的农耕社会人际冲突成本高的情况。意大利语习语更直白，“patto chiaro，amicizia lunga”(协议清楚，友谊长存)，适应商业城邦文明，因为信息明确性对交易至关重要。

最后，在全球化的共同视角下，两者习语演变路径存在差异但趋势相似，根据Granovetter(1973)“弱连接”理论，汉语习语正经历从强连接依赖向弱连接适应的演变新兴表达。如“社交牛逼症”反映当代弱连接社会的身份建构，而意大利习语则在保持家庭强连接的同时，持续强化契约弱连接的双轨运行，“sangue del mio sangue”(我血脉的血)与“networking”(建立人脉)并行不悖。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差序文化模型是对传统边界清晰的“内/外群体”理论的有益补充，而意大利“团契家族”模型则展示了在西方文明谱系内一种基于血缘、地缘和宗教形成的、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强联结”社会网络。这与北美模式中基于个体选择的“弱联结”网络形成对比，为跨文化社会认知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参照点。

5 结　语

本文遵循“理论-实证-模型”三重逻辑链，在理论架构、方法论设计及分析视角上均实现一定的创新。研究以具身认知理论和文化语言学为双核，确立“身体经验→文化图式→社会模型”的语义生成路径。对比中国的“差序格局”，我们在综合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团契家族”作为社会文化比较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将具身认知理论、文化语言学与社会结构模型系统整合，构建“身体-文化-社会”三维互释框架。我们认为这样的整合突破了传统研究中认知机制与文化背景的割裂，揭示了习语语义实为具身经验经文化图式过滤后对社会结构的符号化映射。

本研究采用语料驱动的对比分析法，通过词频统计锁定文化核心范畴，结合概念融合理论阐释具身隐喻如何升维至文化图式，完成“身体操作→文化意义”跃迁。在分析视角方面，通过习语语料，我们提出中意习语共享身体基础，但编码焦点不同，汉语重社会评价，意语重生理功能。同时，汉语习语系统化承载“人情-平衡-关系”范畴(差序格局操作指令)，而意大利语习语结构化呈现“血-海-灵”范畴(团契家族双轨逻辑)，两者文化语义差异的深层机制在于汉语以同心圆语义场(情、礼、关系)实现差序弹性调控，而意大利语以区块式语义场(家庭/契约/个人)维持制度性互补。中国的“差序格局”通过圈层区隔机制、关系动态调控、面子管理系统三个维度在汉语习语中得到系统性体现，而意大利的“团契家族”模型则

通过家庭中心主义的文化编码、契约机制的补偿性功能、双轨信任结构的动态平衡在意大利语习语中获得到深度映射。最后，论文还提出文化模型亦是语言操作系统，习语不仅是社会结构的反映，更是其动态维持工具。

本文通过具身认知的“身体嵌入性”与文化图式的“社会嵌入性”耦合，说明了语言意义生成是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协同进化的产物，弥合了认知与文化的鸿沟。而将费孝通“差序格局”等宏观模型操作化为微观语言现象，则为跨文化社会比较提供新计量维度。本研究一方面可以为语言教学提供“文化图式”参考，提醒教师在习语教学时同步植入文化范畴，规避因语义错位导致的交际冲突（如汉语“关系”≠意语“relazione”）；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考虑“具身等效”效应，使得跨文化交流和翻译保留身体隐喻的文化赋值。

尽管本研究就中意习语的共性与差异反映不同民族共通的认知基础及特定文化发展路径方面做了一些的工作，但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未来如能对汉语与其他欧亚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构建更加完整的文化语言学体系。其次，在方法论层面，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未来研究可以构建更大规模的多语言习语语料库，运用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进行更加精确的词频统计和语义分析。最后，在跨学科融合层面，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加强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对话，将语言学研究置于更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视野中。特别是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并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促进跨文化理解与对话，将是语言学研究面临的长期课题。

[本文为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意大利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项目批准号：19YJC740089）阶段研究成果。项目负责人：吴菡]

注

[1] 文旭，司卫国.具身认知、象似性与翻译的范畴转换[J].上海翻译，2020（3）：1.
[2] 严明，俞理明.文化语言学视阈中跨文化教育的战略意涵[J].当代外语研究，2025（2）：156.
[3] 程新贤.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庭特征[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0，24（3）：102.

参考文献

陈村富.地中海文化圈概念的界定及其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7（1）.
韩央迪.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福利国家家庭政策的发展脉络与政策意涵[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
胡壮麟.对具身认知理论的探讨——Littlemore《思维隐喻：具身隐喻变异的起源》简介[J].中国外语，2025，22（3）.
林书武.隐喻研究的基本现状、焦点及趋势[J].外国语，2002（1）.
牛保义.认知语法的具身性[J].外语教学，2016，37（6）.
肖开容.认知翻译学的名与实[J].语言、翻译与认知，2021（1）.
文旭.文化认知语言学初探[J].外国语文，2024，40（5）.
王文斌，姚俊.汉英隐喻习语ICM和CB的认知对比考察——以汉语的四字格隐喻习语为基点[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5）.
仲伟合，朱琳.具身认知视角下的翻译认知心理特征与过程[J].外国语，2015，38（6）.
周春生.文化是个性与精神的呈现——写在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发表150周年之际[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9（3）.
Banfield E C.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M]. Glencoe: Free Press, 1958.
Barsalou L W. Grounded Cognition[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8, 59(1).
Bergen B K. Louder than Words: The New Science of How the Mind Makes Meaning[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De Knop S, Boers F, De Rycker A. Fostering Language Teaching Efficiency through Cognitive Linguistics[M].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10.
Durkheim É.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M]. Paris: Alcan, 1893.
Durkheim É. 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M]. Paris: Alcan, 1912.
Gramsci A.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
Gibbs R W. Embodiment and Cognitive Scien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Holland D, Quinn N. Cultural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Khatin-Zadeh O, Farsani D, Hu J, et al. A Review of Studies Supporting Metaphorical Embodiment[J]. Behavioral sciences, 2023, 13(7).
Kövecses Z, Szabó P. Idioms: A View from Cognitive Semantics[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6, 17(3).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Lakoff G,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Moseley R, Pulvermüller F. Nouns, verbs, objects, actions, and abstractions: Local fMRI activity indexes semantics, not lexical categories[J]. Brain and Language, 2014, 132.
Palmer G B.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s[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
Pulvermüller F. Brain mechanisms linking language and action[J].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005, 6.
Putnam R D.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Sharifian F. Cultural Conceptualisations and Language[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1.
Sharifian F. Cultural Linguistics: Cultural Conceptualizations and Language[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7.
Santa Ana O. Brown Tide Rising: Metaphors of Latino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Public Discourse[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2.
Tajfel H, Turner J C.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C]//Austin W G, Worchel 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Monterey: Books/Cole, 1979.
Varela F, Thompson E, Rosch E. The Embodied Mind[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1.
Wierzbicka A. Semantics, Culture and Cognition: Universal Human Concepts in Culture-specific Configuration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Wierzbicka A. Understanding Cultures through Their Key Word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Yu N. The Chinese Heart in a Cognitive Perspective[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8.

作者简介：吴菡　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意大利研究中心　外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语言学
联系方式：Email：wjxiangxiao@126.com

Embodied Cognition and Cultural Schema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Italian Idiomatic Semantics —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Linguistic Mapping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and "Coexisting Model of Contract and Familism"

Abstract: Idioms, as unique linguistic expressions carrying cultural connotations, serve as important windows into national cognitive patterns and socio-cultural psychology.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idioms in Chinese and Italian reflect their respectiv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emantic level. By integrating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which emphasizes cognition grounded in bodily experience) with cultural linguistics (focusing on cultural schemas, categories, and models), and employing contrastive analysis alongside corpus-based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idiom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idioms in both Chinese and Italian profoundly embody the foundation of embodied cognition, extensively borrowing imagery of body parts, sensory experiences, and the physical world to construct abstract meanings, yet they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pecific expression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Chinese idioms distinctly map onto the cultural model of 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highlighting social norms related to interpersonal distance, hierarchical order, and "renqing" (human feelings) and "mianzi"(face) in social interactions. Italian idioms, in contrast, prominently reflect the dual social logic of the "Coexisting Model of Contract and Familism", representing family-centered bonds alongside contractual group cooperation, embodying cultural values such as family primacy, collective honor, member loyalty, and social performance (e.g., "bella figura"). The cultural schemas and categories carried by idioms in both languages demonstrate clear cultural specificity. By systematically integrating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cultural linguistics, and sociocultural models, this paper offers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study of idioms.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of authentic corpora, it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semantic generation mechanisms of idioms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ly grounded insights for Sino-Italia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language teaching.
Keywords: Idioms, Cultural Semantics, Embodied Cognition, Cultural Schemas,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Coexisting Model of Contract and Familism

Author's Information:
Wu Han (Fe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China
Linguistics
Email: wjxiangxiao@126.com

（责任编辑：李广悦）